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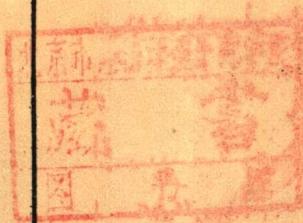
同城文治大論

吳孟復著

I207.6
9
53554

吴孟复著

同城文治述論



安徽教育出版社

(皖)新登字03号

桐城文派述论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75 字数 150000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2,000

ISBN7—5336—1106—8/G·1555

定价：3.90元

傳神絕妙詞。此中消息待真知。潯陽
江上漁歌子。本不同于富貴詩。

傳奇詔草寫人工。校法归方授掌中。一自
寒花傳葬志。多從逸事顯神通。

語體莊嚴語法通。修詞貴浩古今同。望溪
義疏無神祇。只在文从字順中。

我學文章由柏規。健而曲達愧吾師。文能尽意
真難事。此被當從比兴知。

語言文學妙相通。炳炳誰為一代雄。欽就相城談語
用。諸君詢海城翁前(于有吾自謂半個相城人)。一
文字從未愛白描。故衣不敢苟方挑。空。矜手休輕
拟。明底何曾着汝曹。

原舊作論相城派十首之六

孟德

作者手迹

106
CAC84

忠友序

卷之三

道作文者展读欲醉之至者今于彼有二端
大文有极少学者文而有雄骏之气清丽之思与
三才之体自然成其文者为妙少也

夫我所學者之全，非復吾師也。其間或有遺失，則吾所傳者，亦復不無失傳。故吾嘗謂人曰：「吾所學者，固已遺失十之八九，而吾所傳者，亦復失傳十之八九。」

辨說之猶是文。字中之字，多反指。躬行之也。躬行之也。己亥士所自立。其後者研在庭。与人謀者不與同。

當此之時，若乃輒以爲古文之學，須臣一者，用以成其事業，則無以成其事業。若乃輒以爲古文之學，須臣一者，用以成其事業，則無以成其事業。

不與予之文其甚矣可也。苟有以通其意
得諸於心平其事有成矣。一念便得
所者一不復可掩也。一念才生

諸君之口皆爲我所制

卷之三

某示格不凡。公用事之。希

姚姬传先生手迹

前 言

本书论述了“桐城文派”的历史渊源、艺术特色、师友传授、诸家风格。史论结合，述中有评。虽博采通人，实皆出己见。凡此论述，十之七八，为前人之所未言；然又必有史实为依据。

其一，指出“桐城文派”之思想渊源，出于“泰州学派”与“颜李学派”，这样，虽出“理学”，而实是先进思想。

其二，指出“桐城文”是文艺散文，它源于归有光，尤在于把小说技巧吸收到散文中。名为“古文”，实属“新变”。

其三，指出“桐城文”作者几乎皆是教师（桐城那么多的翰林、宰相却皆非“桐城文”作家），人讲人品，文讲文法。他们擅长的是简洁而传神的“小文章”。它不是“庙堂文学”、“山林文学”、“清客文学”，自然也不是“市井文学”。

其四，指出“桐城文”本不是封建文学的“正宗”。唐宋以来直至民国，朝廷诏令、官场奏启，皆用骈俪而不用古文。文从字顺的古文是无法揄扬歌颂的。“桐城派”既非“正宗”，自然也不是“谬种。”

其五，从文学言，“桐城派”这种“雅洁”文章，不便

于铺张扬厉，歌功颂德；但从语言言，它的“词必己出”、“文从字顺”，却又体现了汉字、汉语的优越性，适合于学术、政论、应用诸种文体。“桐城派”把“文章写通”，特别是语体方面、篇章方面的论述，暗合于后来出现的语言科学，有很大的学术意义与实用价值。

其六，本书对“桐城三派”即“桐城学派”、“桐城诗派”、“桐城文派”分别作了评介，特别是对诗派言之尤详。既指出“三派”之区别，这样就省去了许多纠葛；同时又指出三派之间的相互影响，特别是“散文诗化”这一点，正是“桐城文”的神韵的由来。

其七，本书对“阳湖”、“湘乡”两派也作了比较详明的评介，特别是对它与“桐城派”的渊源与异同，作了较多的论述。还有三派以外的作者，如龚（自珍）、魏（源）、李（慈铭）、王（闿运）以及后来的陈三立、章炳麟等皆有简要评述，足供参考比较。论述“桐城”，而并不视之为“一尊”，论述诸家（包括“阳湖”、“湘乡”及三派以外之作者），而又明“桐城”文为用之广；对诸家有褒有贬，与一般论点亦不尽相同，这又是本书作者着眼所在。

其八，本书对方、戴、刘、姚、梅、张、吴、马等除了节录碑传外，还就其生平与学风、文风作较详之论述，其重点则视其人学行实际，特别是研究中有疑的问题（如戴的遇祸之由与姚的早退之故）。对其他作家亦视其有关问题作了重点评介，特别是：文人总是以文为主的。《史》、《汉》于文人皆录其作品，较之空言，更为切实。本书于张惠言、恽敬、梅、管似至二姚，皆各录其文一两篇（段），尝鼎一脔，足以知味。

其九，本书对重要作家之著作，特别是刘大櫆的《论文偶记》、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马其昶的《桐城耆归传》及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吴孟复等校注）、王先谦、黎庶昌两种《续古文辞类纂》等等，皆特作介绍，以其皆研究“桐城派”之重要资料。其他皆随文注于行间。

其十，本书立论虽新，但皆持之有故，求是于实。一言一例，皆有根据，此在书中，处处可见，决不敢望文生义，既不作无稽之谈，亦不作浮泛夸诞之论。书中博采清代学者之说，对于“桐城”老辈的甘苦之谈，尤所注意甄录。同时，又广泛吸收现代通人之论，不拘门户，惟求真切；其随人作计，或浅或隘，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者，则在所不取。

鄙人论文，一向认为“言能尽意”，“诗有达诂”。故此书中颇探“思表纤旨，文外曲致”，力求“阐其妙”而“通其数”，进而使“作文之利害”，亦即文之“妍媸好恶”，皆有“可得而言”。于是以成“文章学”之专书，助“语文课”之讲析。七十老翁，断不敢以无实之言，误人子弟也。

吴孟复 谨记

目 录

前言	100
第一章 “桐城文派”及其历史渊源	1
第一节 “桐城文派”的历史渊源	2
第二节 “桐城文派”与古文	6
第三节 “桐城文派”与骈文	12
第二章 “桐城文派”的地理因素	17
第一节 “桐城文派”与桐城	17
第二节 “桐城文”与桐城学	21
第三节 “桐城文派”与“桐城诗派”	26
第三章 “桐城文派”的艺术特色	40
第一节 把小说描写方法运用到散文中	40
第二节 为散文语言的纯洁而努力	43
第三节 “桐城文派”在历史上的革新意义	52
第四章 方苞、戴名世与“桐城文派”	57
第一节 方苞传略	57
第二节 戴名世传略	62
第三节 方苞与理学和八股	67
第五章 刘大櫆与“桐城”“阳湖”二派	71
第一节 刘大櫆传略	71
第二节 刘大櫆与“桐城派”	80
第三节 刘大櫆与“阳湖派”	89

第六章 姚鼐与“桐城文派”	98
第一节 姚鼐传略	98
第二节 姚鼐与当时学风	100
第三节 姚鼐的文论与文风	103
第四节 姚鼐的古文成就	110
第五节 姚鼐的《古文辞类纂》	112
第七章 姚门诸子	117
第一节 姚鼐弟子与“桐城派”之播及全国	117
第二节 梅曾亮与“桐城派”	119
第三节 管同、姚莹与刘开	129
第四节 方东树与《昭昧詹言》	134
第五节 派外诸家	138
第八章 “桐城派”与“湘乡派”	144
第一节 “湘乡派”与“桐城派”	144
第二节 曾国藩	146
第三节 张裕钊与吴汝纶	150
第四节 薛福成与王先谦、黎庶昌及两《续古文辞类纂》	156
第五节 贺涛及其弟子	161
第九章 马其昶、二姚与陈三立等	166
第一节 马其昶	167
第二节 姚永朴与《文学研究法》	177
第三节 姚永概	181
第四节 马姚交游	182
第十章 怎样诵读、研究古文	192
第一节 读选集与别集，注意方法	192
第二节 辨时文与古文，排除误解	198

第三节 分前期与后期，讲明得失	202
第四节 合语文与史哲，贯以新知	205

附录

方望溪遗集序	211
书姚仲实《文学研究法》后序	217
《刘大櫆集》序	219
《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序	229
《萧敬孚年谱》后记	233

第一章 “桐城文派” 及其历史渊源

“桐城文派”，旧称“桐城派”，指的是以“古文”写作为主要的一种艺术流派。但桐城还有“学派”与“诗派”，三者互相影响，而又不必尽同——如“学派”中的主要人物方以智，其文章却是明末复社一路，秉承“七子”，师法秦汉；故与“桐城文派”的导源“唐宋八大家”与归有光者不同。但“桐城文派”在学术思想方面，又很受方学渐——方以智的影响；而方苞的学承颜(元)李(塨)，则又为“学派”注入新的内容。方苞不作诗，但刘大櫆、姚鼐则把古文之抑扬顿宕技法，用入诗中，成为“诗派”的特色之一；同时又把诗歌的美引入文中，使散文诗化，这又成为“桐城文”的艺术特色之一。三派相互影响，然又非完全一样。故分而言之，则各有特点，轮廓分明；合而言之，则绕缭不清，立论反难。如清·钱大昕即因方苞文中把“桐城”写作“吾桐”或“桐”，便加以鄙弃，以为“不足观”。其理由是当时各省中以“桐”为县名的，如“桐庐”、“桐乡”等等，共有五县，仅称一“桐”字，那怎能知是“桐城”呢？但是，方苞写的是文艺性散文，而不是科学性的“地志”，也不是历史；且作者是桐城人，他文中的“桐”自不会被人误解为“桐庐”、“桐乡”。过去许多人对“桐城文”的责备，正

是把“学派”与“文派”混为一谈而引起的。所以，我们特地标明“桐城文派”，这样，可以减少许多纠葛。

再说，过去一些对“桐城文”的抑扬，大都仅据某些概念，如“理学”、“八股”，而对之缺少具体分析。拿理学说，其中有许多流派，这是人们共知的。“桐城理学”是哪种流派呢？这种流派特点如何呢？方苞说的“制行在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这话是从哪里来的呢？（方苞文中并没有这句话，它是“颜李学派”学者王兆符记下而加以称赞的）还有方与颜李关系研究如何呢？刘大櫆与方苞，姚鼐与戴震，其间关系如何？异同如何？皆有待于深入探讨。“桐城派”所讲的文艺理论、文学主张，也须结合其具体作品进行分析，如果只是从概念到概念，那就永远讲不清楚。

这里，先就“桐城文派”的历史渊源，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第一节 “桐城文派”的历史渊源

什么是“桐城派”？它的渊源如何？过去讲的人很多，我认为吴敏树说最为得当。吴敏树说：

今之所谓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间姚鼐中称：私淑于其乡先辈望溪先生之门人刘海峰。又以望溪接续明人归震川（有光），而为《古文辞类纂》一书，直以归、方续八家，刘氏嗣之。

为什么说这段话最得当？这里要作些分析。

（1）他认为“桐城派”是一个“文派”。按我的理解，它是一种文艺散文的流派，而不是一个学派。因此，就不存在

在什么“义理、考据、词章”的问题。姚鼐生当乾隆中叶，考据盛行，他曾想拜戴震为师，戴震没有接受，但在给他的信中，提出了“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这个名论。戴震讲的本指治学方法而言；姚鼐将其解成宋学、汉学、文学，已非戴震原意；曾国藩说姚鼐“一篇之中唯此尤竟”，硬把姚鼐说成反汉学，把“桐城文学”讲成“桐城学派”，不仅不合事实，也混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造成研究上的困难。“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师姚仲实(永朴)就说：古文家“一异于义理家”，“二异于考据家”，“三异于政治家”，“四异于小说家”(《文学研究法·范围》)。这段话是很有见解的。所以，对比“桐城派”，首先要分清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要扫除旧说中许多纠葛不清的地方。

(2) 吴敏树认为：“桐城文”是韩欧等“八家”的“古文”的延续。什么叫“古文？”李兆洛说：“六经之文，斑斑俱存。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体。”但唐宋以后，朝廷的制诰，大臣的表章，官场的书启，也还是多为“骈四俪六”的文字。这就是韩愈在《与冯宿论文书》中说的“俗下文字”。与这种“俗下文字”相对称的是“古文”。“古文”一词亦即见于韩愈此书中。“四六”来源于六朝骈文，六朝骈文又源于东汉崔(瑗)蔡(邕)。故有人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自崔、蔡之文来看，多用典故，堆砌词藻，如崔、蔡“言孝必曾、闵”，说话夸大，已非事实；而骈文用语更多含糊。正如陆机在《文赋》中所说：“恒患意不称物，文不尽意。”那末，六朝及唐直到清末、民初，朝廷上、官场上为什么还一直沿用“四六”骈文呢？原因就是由于那本是“官样文

章”，原属假话，本无真情；而骈文恰能无中生有，以假为真。脸上有麻子，“以玉冠之”就美了。这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宫廷文学”、“庙堂文学”总是以骈俪为主的缘故。自韩、柳到桐城派，主张散体，反对骈文，就是要用比较准确的语言，力图使文能达意。

但是，又应看到：“八代之文”还有“盛”的一面；韩、柳对“八代”虽有改革，也有继承。小说、寓言、人物传记、山水游记都是在六朝时发展起来的。韩、柳自己虽然绝口不言“六朝”，然而，实际上其文之妙处正自“六朝”来。姚鼐已认为柳宗元文“用《水经注》兴象”；吴德旋（宜兴人，也是“桐城派”作者之一）亦认为柳宗元的《梓人传》等“未免小说气”；姚仲实（永朴）叔节（永概）又说韩愈《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兰田丞厅壁题记》近乎小说；而陈寅恪更明白地说出韩愈文章之妙皆自小说与变文来。我们也认为：不仅《毛颖传》是小说，《祭鳄鱼文》与《送穷文》一样，也应属于寓言，均来自六朝的《修竹弹芭蕉文》。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六一先生传》，继承六朝之痕迹亦甚明白。当然，这不是说他们模仿六朝，而是说对前人之长有所借鉴与吸收。这样说，应该是合乎实际的。

我们认为：只有以这样的观点，才能理解韩、柳；也只有以这样的观点，才能正确理解“桐城派”是怎样继承韩、柳的。“桐城派”对韩、柳的继承，主要是继承他们反对浮华的骈文，力求用白描的、简洁的语言来抒情达意；同时，也继承了韩、柳的有继承、有革新的精神。

（3）吴敏树认为“桐城派”的直接渊源是归有光。这比把归与王慎之、唐顺之、茅坤混为一谈的见解高出一筹。因

归有光并不是简单地模唐仿宋，其真正源泉乃在于吸收了评话、小说的描写方法，而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之于散文。

归有光自己说他的文章是学《史记》的；但他评《史记》时却说：“太史公但至热闹处就露出精神来了，如今人说平话者然，一拍手又说起，只管任意说去；”又云：“《史记》如二人说话堂上，忽撞出一人来，即挽入在内。”由此可见，他是把《史记》的写法与平话小说的表现手法结合起来，从中悟出写作技巧的。归有光所写多为社会中下层及一些孤儿寡妇的日常生活。张士元说：“余尤喜其叙事诸文，虽世俗琐事，皆古雅可观……读之使人喜者忽以悲，悲者忽以喜，不自知其手舞足蹈而不能自己也”。（《震川文抄序》）归有光用小说的白描手法与简洁生动的语言，写出“小文章”。闻一多指出这种写法，给散文开辟了一个新境界。“桐城派”对归有光的继承，正在于继承这种“小文章”的写作技巧。刘熙载说归有光“小文章好”，章太炎也说“刘才甫（大櫆）小文章好”，可见两者之间的渊源。

（4）吴敏树还认为“桐城派”始于方苞，盛于姚鼐。方苞处在明亡未久的时候。桐城方氏一家与明末的东林、复社关系极为密切（左光斗、方孔炤、方以智、方文、钱澄之等人皆与东林、复社有关。）方苞父亲是明末遗老，方苞兄弟是在明朝遗老杜濬、张怡等人直接熏陶下成长的。特别是在当时，讲理学、讲文学，首先都要讲气节，要严“夷夏之防”。方苞与李塨、戴名世交好，应该是由于气类之同。彭绍升说：方苞“所书明季诸公逸事，发微阐幽，生气坌涌，尤足使顽廉懦立也”（《望溪逸稿序》）不难想象，如果不是文字狱的关系，方苞的文章内容，应该是继复社、比《南山》的。事实

上，桐城民间至今亦尚以方、戴并称为“桐城派”。就我们看来，不仅戴名世，即钱澄之亦当为“桐城派”之先导（章炳麟、陈衍曾有此看法）。

复社文人、明末遗老比较关心现实，文章较有内容；但在文理、语法上不甚讲究。方苞说：“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从纯洁语体、严密语法来说，方苞主张“气清词洁”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如果以气清词洁之文写较丰富的社会内容，那应是很理想的。但是，清王朝一面提倡理学，一面大兴文字狱。“方戴两家书案”相继发生，很多桐城人被株连，方苞亦因之下狱。戴名世既腰斩，《南山集》等成为禁书。文字狱使方苞及后来的刘、姚等人慄慄危惧，谨小慎微。因而，桐城派只写一些“小文章”，那是势所必至的了。

第二节 “桐城文派”与古文

什么叫古文？吕思勉作过解说，他说：

至唐韩、柳出，以古人说话之法——即文字未浮靡前之文法——说当时之话，而此运动乃告成功。

然则，所谓古文者性质如何？论古文最要之义，在雅、俗之别（亦称雅郑）。必先能雅，然后有好坏可说。如其不雅，则只算范围之外，无以评论好坏。故雅俗为古文与非古文之界限。所谓雅者何也？雅者，正也。即正确之义，“同时亦含有现代心理学上所谓文雅之义，即用于实用之外，尚能使人起美感。

吕先生的话是很有见解的。他讲的“正确”，意味着词、